

东方文化联盟^{*}

——20 世纪 30 年代大阪的亚细亚主义

〔日〕 泷口刚^{**}

摘 要 东方文化联盟成立于 1931 年，获得了大阪商界和报界的支持，以促进“东方各民族的理解与和睦”为宗旨。它关注与亚洲国际交流，举办各种讲座报告，发表公报。东方文化联盟的领导人为能远离政治中心东京，而在经济和贸易城市大阪承担民间外交而感到骄傲。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其最初动机不同于主张“亚洲盟主论”的大亚细亚协会。然而，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联盟的活动蜕化，走向了“大东亚共荣圈”之路。

关键词 东方文化联盟 亚洲主义 中日关系 东亚关系 中日战争

前 言

本文通过“东方文化联盟”的活动，管窥 20 世纪 30 年代存在于大阪的亚细亚主义。

1931 年末，东方文化联盟以“谋求东方各民族的理解与和睦”（规约）为目的，在大阪财界、报界人士的支持下建立。该联盟致力于演讲会以及同

* 本文系 JSPS 科研项目 17K03539 的阶段性成果。

** 泷口刚，日本大阪大学法学科教授。

亚洲各国的国际交流，并在 1941 年前陆续发行『東方文化聯盟会報』第 1~3 号、^①『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4~19 号。^② 这些资料是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大阪财界、文化界、报界亚细亚主义的绝佳材料。

陶德民曾对东方文化联盟进行过研究，其研究着眼于介绍联盟成立的过程及其与内藤湖南的关系。^③ 东方文化联盟虽然标榜为“文化”团体，但其活动与同时代的外交、大陆政策密切相关，学界尚需从该角度对其展开进一步研究。另外，东方文化联盟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情况也几乎没有人提及，本文也将就此进行梳理。

此外，关于大阪财界人士与“亚细亚主义”，虽然松浦正孝等人的研究有所涉及，^④ 但若能够明晰东方文化联盟的动向，就可以厘清日本曾存在不同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亚细亚主义这一事实。

本文揭示了最初以比较稳健的亚细亚主义为基调的东方文化联盟，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逐步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路的过程。

一 东方文化联盟的创立

依据规约，东方文化联盟在大阪设置事务所，并设有若干名“规划各种事业并落实”的理事和若干名“参与理事会商议”的评议员，经费来源是会费^⑤与捐赠。

首先通过理事群体来考察东方文化联盟的主导人物。创立之初的理事有

① 以下简称『会報』。

② 以下简称『会誌』。

③ 陶德民「内藤湖南と東方文化連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3、2008 年 12 月、3-18 頁。

④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 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其中关于兼任联盟理事的村田省蔵，参见半沢健市（2007）『財界人の戦争認識 村田省蔵の大東亜戦争』、神奈川大学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2007 年；王宗瑜（2007）「村田省蔵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中国認識を中心に」『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37 号、2007；松浦正孝「村田省蔵と実業アジア主義」、黄自進ほか編『「日中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

⑤ 毎年 5 日元。

岩井胜次郎(岩井商店创始人)、末广重雄(国际法学者、京都大学教授)、神尾茂(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东洋史学家、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栗本勇之介(栗本铁工的社主)、平川清风(大阪每日新闻记者)、佐多爱彦(原大阪医科大学校长)、村田省藏(大阪商船副社长)、清水银藏(众议院议员)、森平兵卫(大阪商工会议所评议员)。^①

可见,东方文化联盟的理事都是与大阪有关的人物,可以分为知识分子(末广重雄、内藤湖南、佐多爱彦)、报界人士(神尾茂、平川清风)、财界人士(岩井胜次郎、栗本勇之介、村田省藏、森平兵卫)、政治家(清水银藏)。

清水银藏、内藤湖南、佐多爱彦主导了东方文化联盟的创立,其中又以清水银藏为核心人物。清水银藏师承犬养毅,是滋贺县选出的政友会众议员。清水银藏从东京专门学校毕业后,曾就职于爱国生命保险等处,第十五次众议院候补选举(1924)时由革新俱乐部提名当选,后因政党合并转属政友会。清水银藏比较关注大陆,“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对朝鲜及满洲进行了视察,1919年又曾计划视察北满、华南,还在1929年随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前往中国,参加孙中山的葬礼”。^②

特别是1929年犬养毅受邀参加孙中山葬礼之际,清水银藏与犬养毅同行,这成为他创立联盟的契机。清水银藏在讲述联盟创立始末的文章中讲到,上海市长张群举办的欢迎会席间“木堂先生(犬养毅)开场白中提到的自己和孙中山对东亚大局有共同的目标,因境遇相同,自然成为至交,互相扶持等语”使他深受刺激。^③众所周知,犬养毅与孙中山的关系,源于与头山满及大陆浪人一起,在明治末年孙中山逃亡日本后援助革命派。

清水银藏赞同犬养毅的“亚细亚主义”,萌生了发起联盟的想法。“亚

① 规约、理事、评议员见《会报》第1号卷首记载。

② 「立憲政友会滋賀県支部長 清水銀藏氏」、滋賀日出新聞社經濟部編『大津市人物名鑑』、滋賀日出新聞社、1936、121頁;另参见「清水銀藏」『政治家人名事典』、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0、262頁。

③ 清水銀藏「東方文化聯盟會報設立に至るまでの経過」『会報』第1号、1923、1頁。犬养毅和头山满受邀参加蒋介石举办的奉安大典,古岛一雄、萱野长知、犬养健等人亦同行(清水銀藏「木堂先生隨遊記」『木堂雜誌』第六卷九号、1928、5~25頁。再次收录于:犬養木堂先生伝記刊行会編『犬養木堂伝』中巻、東洋經濟新報社、1939、742~767頁)。

细亚”不局限于中国，也涉及印度、中近东。清水银藏称“不仅是中日两国，印度、暹罗、安南、菲律宾、阿富汗、波斯、土耳其、阿拉伯也全部属于亚洲国家，一想到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目的，就会深感日本使命之重大。随先生同行一事，使我深受启发，从那之后该问题就在我脑海中徘徊不止”。

清水银藏计划以关西为中心，借用犬养毅的人脉实现组织化。他同与犬养毅关系密切的大陆浪人萱野长知的谈话成为直接的契机。萱野长知曾与宫崎滔天、平山周等创建革命评论社援助孙中山，之后奉首相犬养毅之意在九一八事变后前往中国，谋求调整两国关系，但未能成功。^①

据清水银藏回忆，联盟创立的直接契机是印度政府于1930年2月发表关税上调声明和甘地被捕。在与萱野长知的谈话中，清水银藏称“特别是如阪神两市，虽然每年都保持着数亿日元的通商交易，但除通商交易外则处于无理解、无交涉状态，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应该在大阪创设一个稳健的实体机构，以促成各种交流氛围”。

清水银藏首先与相岛虚吼（相岛勘次郎）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协助。相岛虚吼入职大阪每日新闻后任副主编、顾问等职务，后于1912年由立宪国民党提名当选众议员。^②相岛虚吼属犬养系，同时在大阪的报界、财界拥有人脉。

另外，清水银藏同与犬养毅关系匪浅的内藤湖南取得联系。^③内藤湖南曾在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负责东洋史讲座，退休后隐居在京都。内藤湖南批判英国统治印度的行为，认为“有着世界上最优秀、最古老文化的印度被文化底蕴浅薄的英国统治，这是极不合理的。世界上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当然终将得到合理的恢复。只要让印度独立，余则便容易得到解决。然则中日问题也可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他答应帮忙，成为联盟的命名人。曾在大阪朝日新闻任职的著名东洋学者内藤湖南的加入，具有重要意义。内藤湖南参与了东方文化联盟的创立并担任理事。

① 参见崎村義郎（久保田文次編『萱野長知研究』、高知市民図書館、1996、215～228頁。

② 参见「相島勘次郎」、前掲『政治家人名事典』、4頁。

③ 内藤湖南与犬养毅的交往，参见前掲『犬養木堂伝』中巻、771～772頁。

清水银藏等人还联系到加入日本国籍的印度独立运动家拉斯·比哈利·鲍斯(Rash Behari Bose),并得到他的协助。鲍斯在1915年逃亡日本时受到犬养毅、头山满的帮助,同样是与犬养毅有关的人物。^①鲍斯还是神户的贸易商,立志于印度独立,他给清水银藏等人介绍了萨哈一(Anand Mohan Sahay)。萨哈一也参与了东方文化联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鲍斯和萨哈一与日本政府及军部的关系逐渐加深。^②

此外,清水银藏也得到了大阪医科大学校长佐多爱彦的协助。佐多爱彦是大阪医学界、高等教育界的代表,在财界也有广泛的人脉,他的协助也十分重要。^③

可以说,清水银藏、内藤湖南、佐多爱彦三人是创立东方文化联盟的号召者。

但是,联盟的建立并不顺利。本应是中心人物的相岛虚吼病重,而通过他介绍的大阪商工会议所理事高柳松一郎、大日本纺纱联合会会长阿部房次郎、日本棉花社长喜多又藏拒绝成为联盟的中心人物。大阪财界没有动作,这可能与该时期的政治状况有关。时值以浜口雄幸、若槻礼次郎为首相的民政党内阁执政,大阪财界与民政党内阁关系密切。^④虽说创立联盟与扩张政党势力无关,但对于担任政友会众议院议员的清水银藏来说,这样的政治形势并不利于他的活动。此外,亚细亚主义并不符合币原外交的基调。

尽管如此,以清水银藏、内藤湖南、佐多爱彦为中心,还是在1931年4月、6月分别召开了第一、二次集会。

4月份的集会邀请函中强调了国际局势的紧迫性,即“东洋问题是事关

① 参见前掲『犬養木堂伝』中巻、797~800頁。

② 鲍斯的活动参见A・M・ナイル著(河合伸訳)『知られざるインド独立闘争 A・M・ナイル回想録』、風涛社、1983年;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 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白水社、2005。

③ 佐多爱彦致力于东方文化联盟一事,参见高梨光司『佐多愛彦先生伝』、佐多愛彦先生古稀寿祝賀記念事業会、1940、622~626頁。

④ 参见拙稿「民政党内閣と大阪財界(一)(二)(三)——井上準之助と経済的自由主義——」『阪大法学』第57巻第4号、2007、同第58巻第5号、2009、同第62巻第2号、2012。

帝国存亡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从经济角度而言，意义更为重大，而观目前国际形势，则对支、对印关系尤为重要，考虑到此时俄国的扩张、美国的策动等，此际正是树立帝国大计、使国民觉醒之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情况发生改变，若槻内阁动摇，同年12月成立了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这为清水银藏等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在上述情况下，清水银藏等人经过努力于11月9日在大阪俱乐部召开创立委员会，于12月10日举行创立仪式。

东方文化联盟虽在政治上搭了便车，但其之所以能够得到财界人士的支持，原因大概在于其淡化了政治色彩。会报各卷开头刊登的“东方文化联盟设立的主旨”^①宣告如下：

支那致力于国家的自强与统一，并夜以继日的持续活动，印度独立的要求也十分令人感动。考虑以上两点，以日俄战争为转机被唤起的东亚觉醒，正将步入重要的光复时代。而光复大事，没有东亚十亿人民的紧密团结是绝难完成的。

当今第一要务，是东方各国国民在民族上相互理解，向东亚大局的共同目标迈进。而促进亚洲民族相互理解及和睦，正是本联盟的目的。我等当然深切期望确立种族平等权，在达到经济上共存共荣的同时，实现全人类的真正的进步与幸福。

“主旨”的前半段残留着盟主论的亚细亚主义色彩，但后半段着重强调“促进亚洲民族相互理解与和睦”等与亚洲的交流。

毋庸置疑，东方文化联盟将同亚洲间的通商作为重点。事务局的户田芳助主任高调地发表“商战”宣言“为了正义展开商战，让大阪商人战胜白种人，占领东部地中海以东，该提议完全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大阪商人的正义感。”^②但是，户田芳助曾说“夺回亚洲是木堂先生（犬养毅）

① 『会報』第1号、1932年所収。

② 戸田芳助『我觀東方文化連盟』『会報』第1号、1932年12月。

晚年留下的最大事业”，可见他在犬养系中属于特立独行派，上述言论应该理解成对大阪财界的煽动。

而此后不久，与大阪财界关系密切的佐多爱彦的发言道出了联盟的真实目的“我等共同团体，并非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的半官方机构，而欲致力于实现纯粹的文化亲善目的，并特别避开政治中心东京，在作为国民经济中心的大阪设置本部，希望以此达成目的。尤其是大阪与中国乃至与印度、甚至其他东方诸国的交往比东京还要密切……在民间交往这一点上，大阪比东京更为合适。”^①

联盟核心人物认为，正因为政治形势严峻，所以才更应该以大阪为中心加强与亚洲各国的交流，以此促进国民外交。

二 中日战争前的活动

东方文化联盟主要致力于几个方面的活动。其一，对大阪财界的渗透。东方文化联盟的主要活动有一年一次的总会、国际交流、演讲会、支援留学生、刊行机关志等。1933年11月，该联盟成为财团法人，并制定了事业规划：

1. 阐明东方文化。
2. 互派民间代表。
3. 与东方各国进行文化联络。
4. 与东方各国互派视察团，以及吸引留学生、旅行者。
5. 东方各民族在日本本土居住者的保护事业及其他支援活动。^②

之后几年间，联盟对大阪财界进行了很深的渗透。其会员数在1932年末有200人，之后发展顺利，1933年末增至350人、1934年末为500人、

① 佐多爱彦「文化的親善運動の意義」『会誌』第一〇号、1937年5月、15頁。

② 「財団法人東方文化連盟事業計画」『会誌』第3号、1933年12月、88～89頁。

1935 年末达到 800 人。^① 1936 年末的评议员名单上有阿部房次郎、稻畑胜太郎、野村德七等代表大阪财界的人物，^② 由此可见“联盟的会员大多是公司课长级别的人”。^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外交官、报界人士和学者的体验或见闻而举办的演讲会、午餐会等活动，满足了想在贸易方面广泛获得亚洲相关知识、并扩展关系网的大阪听众的需求。

清水银藏在 1936 年末总结联盟创立以来五年间的活动，累计邀请中华民国 36 人，印度 10 人，苏联 5 人，“满洲国”4 人，暹罗 1 人。^④

除中国、印度外，还可以看到苏联相关内容，这些都说明了联盟的关注点所在。下面来看一下与这些国家有关的活动。

其二，对中国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前外相芳泽谦吉在 1932 年 10 月联盟主办的演讲会上，表达了对日中关系恶化的担忧，同时强调了通商的重要性，他表示从通商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并表达了对东方文化联盟的期待，“总体来说，如果不致力于加强日本与各国的通商贸易，并恢复日本的财政、经济，使其回归正轨，那么日本的将来会是非常危险的”，“当前应进一步加深与东方各国的关系，增进双方互相谅解，为贸易的发展做出贡献，这确实是日本的国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东方文化联盟的目标深表赞同”。^⑤

东方文化联盟本应如芳泽谦吉所期待的那样，在民间层面加深与中国的关系，并展开交流活动。清水银藏还想在中日双方寻找支持者，以便联盟展开活动。但是，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清水银藏“得到京阪神地区中国人的加盟”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⑥

尽管如此，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1933 年 9 月广田弘毅就任外相，中

① 参见清水银藏「会務報告」『会報』第 7 号、1936 年 1 月、36～37 頁。

② 「評議員」『会誌』第 9 号、1937 年。

③ 参见鈴木茂三郎『財界人物評論』、改造社、1936、254～258 頁。

④ 清水银藏「創立五周年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て」『会誌』第 9 号、1937、5 頁。

⑤ 芳沢謙吉「雜感」『会報』第 1 号、1932 年 12 月。

⑥ 清水银藏から戸田芳助あて書簡「会務記事」『会報』第 3 号。

日关系开始稳定下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强烈不安,他所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广田外交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

趁此机会,清水银藏与萱野长知一同拜访了中华民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向他讲述了东方文化联盟的精神,“希望拉拢蒋作宾”。蒋作宾说“这正是早年孙中山与木翁(犬养毅)的共识,乐见其成”。^①清水银藏的这一举动或许是希望通过萱野长知,同蒋作宾(明治末年留学日本)重温(孙中山与犬养毅)旧谊。

但是“中日提携”绝非易事。1933年末,清水银藏等人策划了有中国驻日公馆人员参加的“中日互易会”,但临近实施时,却收到了中方退出的通告。^②

实际上,此时的中日关系十分紧张。1934年4月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谈话(天羽声明)在国际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此情形下,同年5月有吉明(时任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的演讲中,提及中日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在中日关系中依然“作为暗礁残存”的“满洲国”问题。^③

以普及东方文化联盟的思想为目标的清水银藏,在1934年10月开始的一个多月里,访问了满洲、华北、上海,回国后报告了其经过。在这次演讲中,清水报告了他不顾有吉明(日本驻华公使)、船津辰一郎(在华纺纱理事)等人以“大亚细亚主义”名声不佳为借口的反对,坚持与上海市长吴铁城会面,并向其阐述与“大亚细亚主义”不同的东方文化联盟的思想。另外在被问及中国能否统一时,清水银藏表示当地的日本有影响力者认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话就麻烦了”,他对这种看法表示担忧。^④清水银藏关于中国统一化的问题意识,同有吉明一起成为舆论上关于“中国统一化”争论的先驱。^⑤

① 参见前掲、清水銀藏から戸田芳助あて書簡。

② 清水銀藏「挨拶」『会誌』第4号、1934年4月。

③ 参见有吉明「中華民国の近状」『会誌』第4号、1934年7月。根据原文记载,本演讲应该是特意参考了在日本经济联盟会的演讲内容。

④ 清水銀藏「滿支視察歸朝談」『会誌』第5号、1934年12月。

⑤ 关于中国统一化论争,参见根岸智代「一九三〇年代半ば中国再認識をめぐる日本の論壇『中央公論』誌を中心にして」『現代中国研究』2015、77~82頁参照。另外根据该论文,有吉明在此之前就有中国正在走向统一的认识。

联盟支持中国统一，但对满洲却另当别论。户田芳助（联盟主任）从最开始就宣称“亚细亚主义的实现，实际上以满洲国独立为契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①内藤湖南则推进了“日满文化协会”的成立。^②作为理事之一的栗本勇之介则从“统一实现满蒙开发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国民理想”^③角度阐述了“满蒙开发”的意义。此外，1934年下半年，“满洲国”不会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这一认识逐渐被广泛接受。乘飞机去北平访问的《朝日新闻》东亚部长、理事神尾茂在1934年11月的演讲中表示“应该让满洲作为满洲从中国本部脱离进而独立，这件事逐渐明朗起来，因此过去的排日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果”。^④1935年1月，联盟举办了“满洲国”民生部长藏式毅等人的演讲午餐会，^⑤同年3月，又举办了加藤完治有关满洲移民的演讲午餐会。^⑥

1935年5月，中日两国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作宾和有吉明分别出任首任大使，中日关系似乎向前迈进了一步。东方文化联盟邀请驻华全权大使有吉明与中华民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分别做了题为“中日亲善从文化提携开始”、“大阪的昌盛从儒教文化开始”的演讲，两人都强调“文化”上的中日提携。^⑦

但是此后的发展，印证了清水银藏的担忧。在陆军的压力下，华北分离工作逐步推进，1935年11月，“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中日关系又开始恶化。同年末的《会务报告》中，清水银藏表示，虽然东方文化联盟的会员数量有稳步的增加，但在中日关系上“国民外交作为东方文化联盟的使命，还没有得到贯彻”。^⑧

清水银藏反对“大亚细亚主义”、“亚细亚盟主论”的观点，也批判武断的

① 户田芳助前掲「我觀東方文化連盟」、69頁。

② 参见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歴史 草創期を中心に』、2006、74～78頁。

③ 『会報』第1号、1932年12月。

④ 神尾茂「北平訪問飛行と最近支那の印象」『会誌』第5号、1934年12月。

⑤ 藏式毅「空談を排して現実へ」『会誌』第6号、1935年7月。

⑥ 「会務記事」『会誌』第6号。

⑦ 两演讲均收录于『会誌』第6号、1935年7月。

⑧ 清水銀藏「会務報告」『会誌』第7号、1936年1月。

大陆政策。他的一贯立场在东方文化联盟中十分突出,在大阪财界也有其根基。

1936年9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改任驻暹罗特命全权公使,在其前往泰国赴任之际,东方文化联盟与大阪商工会议所、大日本纺纱联合会共同主办了欢送会与演讲会。^①针对蒋介石有意调整中日关系一事,石射猪太郎发言批判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他说“有脱离正常轨道想法的难道不是这边吗?难道不是日本一方吗?”演讲结束后,大阪商工会议所副会长、联盟评议员片冈安,对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政策进行了批判,并回应了石射猪太郎的发言,他说“特别是最近冀东政权建立以来,我国对华外交愈发困难。我坚决认为,这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虽说在这个时候批判我国当局甚为不妥,但必须研究当局的做法还有怎样的改进余地,以便将来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能够正常发展”。

尽管如此,此种对大陆政策的批判并非大阪财界的主流观点。为了搭华北分离工作的便车,大阪商工会议所和实业组合联合会迅速向华北派遣了慰问、调查团。^②联盟内部,栗本勇之介也阐述了以华北分离工作为前提的“日满华经济联盟”论。^③

中国在币制改革后确立了统一化的基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这推动了局势向抗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变。在中日关系变得愈发严峻的过程中,日本各界开始期待林銑十郎内阁的外相佐藤尚武和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等人对外交和大陆政策进行修正,但无明显效果。1937年3月,以中日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的代表团被派往中国。^④

在中日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东方文化联盟致力于“国民外交”,邀请大使、领事及报界人士举办演讲会。

① 石射猪太郎「中国要人の対日態度の一考察」『会誌』第9号、1937年。

② 参见「満州・北支視察座談会(一)」『大阪朝日新聞』1936年10月9日;大阪実業組合連合会編『満州北支視察記 皇軍慰問・産業調査』、大阪実業組合連合会、1936年。

③ 栗本勇之助「大陸政策の合理性と日滿支経済ブロックの結成」『会誌』第10号、1937年5月。

④ 最近关于代表团及其背景相关研究,参见久保亨「近代中国経済の変容と一九三〇年代」、波多野澄雄ほか編『日中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 近代化をめぐる共鳴と衝突』、中央公論新社、2018、152~157頁。

1937 年伊始，联盟为率领访华代表团从神户出发的儿玉谦次、油谷恭一举办了欢送会。3 月举办了中央通讯社东京特派员陈博生的演讲会，4 月举办北平记者团欢迎会。^① 曾留学日本的陈博生，战时升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经理，是国民党方面很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②

但是，在围绕陈博生举办的、以中日交流为基调的座谈会上，分歧也逐渐浮出水面。^③ 此次座谈会上，陈博生希望日本能够用行动来表示“日本并无侵略领土之心，也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思”，与此相对，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亚通信部长冈克晓认为，中国给了英美经济特权，这成为中日两国间的政治问题，并认为“中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防共”的表述，事实上已经表明日本“并没有领土野心”。末广重雄理事也表示“某种程度上不赞成实行大陆政策”，但担忧若日本从华北撤退，共产党恐怕就会趁虚而入。双方都要求对方首先行动。末广重雄虽然总结说，“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就撤退是不可取的，必须谋求双方协作，以求改善中日关系”，但双方的分歧还是逐渐扩大。

可见，在准战时体制下谋求中日合作的清水银藏，其活动空间是十分狭小的。

其三，对印度的活动。东方文化联盟投入与印度相关的演讲和交流的精力，仅次于中国。

在《会报》《会志》的版面中，从联盟创立开始就有参与联盟活动的比哈利·鲍斯和萨哈一作为“印度志士”登场，抨击白色人种和西方对有色人种和东方的统治。例如，鲍斯发表了“文明之母亚细亚”^④、“通商时象中的文化差异”^⑤、“东方的国家主义与西方的国家主义”^⑥、“有色人种的崛起与白色人种的衰微”^⑦等题目的演讲或文章。萨哈一也发表了“东方人、文

① 「会務記事」『会誌』第 11 号、1937 年。

② 「陳博生」『岩波世界人名大辞典 CD-ROM 版』、岩波書店、2014 年。

③ 「陳博生氏を囲んでの座談」『会誌』第 11 号、1937 年 7 月。

④ 『会報』第 1 号、1932 年 12 月。

⑤ 『会報』第 2 号、1933 年 6 月。

⑥ 『会誌』第 4 号、1934 年 4 月。

⑦ 『会誌』第 5 号、1934 年 12 月。

化、联盟(oriental、culture、league)”^①、“亚细亚问题”^②、“印度的佛教现状”^③、“满洲国、菲律宾的独立与亚细亚”^④等题目的演讲或文章。特别是身为神户贸易商的萨哈一,虽然没有成为联盟理事,但却积极参加了各种活动。

1933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废除日印通商条约,因此产生通商纷争,东方文化联盟对此事的应对十分引人注目。

联盟在4月举办了朝日新闻赞助的日印问题演讲会,栗本勇之介、伊藤竹之助、萨哈一、喀布尔等人发表演讲。5月,又为《朝日新闻》“刊发甘地祈求实现印度贱民的平等待遇并断然绝食”一事发去“感谢电报”。^⑤

清水银藏、佐多爱彦、村田省藏、末广重雄等理事及萨哈一出席的联盟理事会发表了如下声明书“印度少数产业支配者打算扩大、强化产业保障法、抵制日货,这必然会导致向三亿五千万民众征收高额消费税,即使不这样,印度国库收入的70%以上也是关税和消费税,这对于在这种恶性税制下苟延残喘的民众来说,是致命的重压。”主张关税上调无异于加重印度民众痛苦的声明书,也被《大阪朝日新闻》^⑥援引并得到关注。但是,这份声明书却期待同英国缔结“互让协定”,并不具备攻击性。声明书中表示:“我们相信,会谈中若有互让协定,必然依赖于以此为基础、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共识。”^⑦

此外,也有很多为印度灾害募集捐款以及文化交流等符合联盟宗旨的活动。除印度外,还举办了与暹罗以及日荷交涉相关的演讲,并广泛介绍包括西亚在内的亚洲的事物与形势。

东方文化联盟与抨击英国统治印度、呼吁亚细亚解放的“印度志士”关系密切,对日英的通商纷争反应敏感,同时期待解决纷争的“互让协

①『会報』第1号、1932年12月。

②『会誌』第3号、1933年12月。

③『会誌』第4号、1934年4月。

④『会誌』第6号、1935年7月。

⑤「会務記事」『会報』第2号、78~82頁。

⑥『大阪朝日新聞』、1933年4月20日。

⑦『会報』第3号会務記事、1933年9月、85頁。

定”，将重点放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上。

其四，对苏联的活动。东方文化联盟也曾在一时间内，出于促进通商的目的对日苏关系表现出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还是在外交相广田弘毅主持下，进行了将北满铁道转让给“满洲国”的交涉。1935年1月，“满洲国”与苏联签订了转让北满铁道的协定。

以此为契机，苏联驻日大使尤列涅夫发表了题为“北铁转让带来的划时代效果”^①的演讲，另外日本驻苏大使太田为吉发表题为“苏联国内外局势与日苏经济提携”的演讲。太田为吉强调日苏关系有缓和余地，通商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另外，联盟举办了大阪每日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小林英生的演讲及苏联情况座谈会。^②

在此背景下，大阪财界期待扩大与苏联的通商。^③身为联盟理事的岩井胜次郎看到了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机会，经营钢铁业的栗本勇之介则期待生铁的进口与铁制品的出口。因此，联盟还计划派遣经济代表团前往苏联。

但在陆军的横加干涉下，该计划受阻。受大阪第四师团司令部外事课主任川口大佐所托，6月21日，联盟举办了参谋本部俄国班长神田正种的演讲，对日俄贸易的期待被浇了一盆冷水。神田大佐“给驻俄大使太田为吉的亲俄说以一击，大阪商人都呼吁不与俄国而是与中国民众缔结经济关系，形成东方阵营，对此身为神户毛织物出口商的印度人萨哈一表示极为赞同”。^④

对日俄通商的期待无法跨过军事政治局势的壁垒。“反共”潮流最终发展到1936年11月日德签订防共协定。

九一八事变之后，亚细亚主义的潮流日渐增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① 『会誌』第6号、1935年7月。

② 『会誌』第8号、1936年7月。

③ 以下记述依据：鈴木前掲『財界人物評論』、251～259頁；清水銀蔵「謝辞」『会誌』第8号、62～63頁。

④ 鈴木前掲『財界人物評論』、255頁。该书中演讲者是第四部课长神田正梗，但或应为神田正种。

东方文化联盟的亚细亚主义究竟占据了怎样的位置,通过与大亚细亚协会的比较,可以发现东方文化联盟的主张与“大亚细亚主义”是有所不同的。

1933年4月,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亚洲的重建及秩序化,是皇国日本双肩上的重任”为主旨,松井石根、近卫文磨、广田弘毅等政治家、军人创立了大亚细亚协会。近期的研究重视该协会作为意识形态组织是如何走上“大东亚共荣圈”道路的问题。^①

诚然,参与大亚细亚协会设立的矢野仁一、鹿子木员信等也是东方文化联盟的评议员,两者的成员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以清水银藏为首的主要成员,持有与“大亚细亚主义”不同的观点。

1936年,大亚细亚协会的松井石根大将等人到大阪举行演讲会。对此,《亚细亚主义运动健全发展与大阪的作用》(《大阪朝日新闻》1936年5月21日)一文称“亚细亚主义”在大阪发出了第一声,该文指出“在大阪,有东方文化联盟策划亚洲诸民族间的文化协作,以此来谋求各民族间的亲善,进而达到推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目的,联盟自1931年创立以来缓慢而平稳地发展,亚细亚主义运动率先从大阪切实地发出和平的第一声。”另外,关于东方文化联盟与大亚细亚协会的不同,该文记述如下:

我们大阪毫无疑问是产业日本的中心、贸易跃进的策划地。因此大阪人的眼界,中国自不必说,远至南洋、印度、非洲,如今则以称霸全球为目标,必然不会只拘泥于亚洲一角。亚细亚主义的活动未必能在大阪得到共鸣,其原因难道不是大阪人的眼界已经走出了亚洲的天地,扩大到世界了吗。但是,大阪人的这个倾向并不会让亚细亚主义运动者失望,相反,在我们看来,通过大阪人的这种倾向,该运动将得到强化和国际性的普及,由此反倒能给亚细亚主义运动的前途带来光明,我们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该报道强调,以大阪为中心的贸易超越了亚洲,以“称霸全球”为目

^① 参见松浦前掲書、504頁以下。

标，并不局限于狭小的亚洲，反倒以“亚细亚主义”的国际普及为目标。考虑到大阪朝日的重要记者在联盟中担任理事，可以认为这是一篇从内部拥护联盟和平主义性质的报道。

即便如此，还是有将东方文化联盟与“大亚细亚主义”同样看待的倾向，对此，清水银藏进行了如下反驳：^①“有的杂志把东方文化联盟的目标，与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者所呼吁的、亦或是军部部分人及外务次官的意志划等号，我们不知道所谓军部部分人的意志，也不清楚大亚细亚主义者的目标、重光氏的特殊理想，如果说建立亚细亚主义这一点，包含着充当号令亚洲的所谓亚洲盟主、只想依靠我们优越之力解决问题的话，这与我们的主张在根本上是相去甚远的。”清水银藏明确表示，东方文化联盟与军部或者“大亚细亚主义”、重光葵外务次官无关，其目标与依靠亚洲盟主论或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志向根本不同。

但是，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联盟内部出现了与清水银藏不同的主张颇为引人注目。例如，1936年12月，报界人士与清水银藏等人在匿名座谈会^②上产生分歧。当时有人反对在日德防共协定的背景下维持现状，希望打破现状的势力抬头，会上有人赞同此种意见。对此，被认为是清水银藏的发言者认为，德国打破现状对英法美来说，不过是德国想要有些改变而已（意为对英法美来说德国打破现状不是什么大问题，“把中国放到对立面，会使我们损失很大”。与此相对，也有发言认为，防共协定未必把中国推到对立面。

由此可见，东方文化联盟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需要警戒戴着“立宪主义、自由主义”面具的法西斯主义，但也有人主张无需如此。质疑纳粹抬头与亚洲局势关联的同时，权力政治理论开始显现。

三 中日战争时期的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局势，使堪称稳健的亚细亚主义发生了

^① 清水銀藏「東方文化聯盟の使命に付て」『会誌』第7号、1936、48頁。

^② 「自由座談会 日独協定、対蘇対支外交問題」『会誌』第9号、1937年。出席者有神尾茂、平川清風、松本健吉、三池玄佐夫、小林英生、清水銀藏、戸田芳助。

方向性的改变。

这一改变的前提,是创立以来的理事相继去世。内藤湖南在1934年6月、岩井胜次郎在1935年12月、清水银藏在1937年4月相继去世。尤其是清水银藏的去世,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标志。

即便如此,在联盟中也还存在着对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担忧。那么,联盟是如何应对全面抗战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过程的呢?

首先,对卢沟桥事变后局势的反应。卢沟桥事变后,在大阪商工会议所的决议等文件中,出现了“对支膺惩”等强硬语句,呈现出强硬论“一边倒”的局面。^①但是,东方文化联盟举办的演讲会上,气氛却稍有不同,弥漫着对中日关系的担忧。

1937年10月,联盟举办了榑崎观一^②的演讲会,聚集了很多听众。联盟理事末广重雄在开幕辞中预测了事变的前途,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彻底击败支那”或许会使中国失去战意,“排日抗日情绪或将变得更加严重”,“我国与支那的关系或将成为1871年以来德法以及战后的德法关系”。榑崎观一也表示“我们不希望将来日支关系变成像德法那样的关系”,他还认为日本政府决心不明,表达了华北前线恐将中日两国拖入全面战争的担忧。^③

这次演讲会聚集了很多听众,可见当时有很多人担忧“事变”的前景,为中日两国对立的长期化感到不安。

其次,神尾茂与汪兆铭工作。正如大家所担忧地那样,在中日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东方文化联盟没能展开太多的活动。此间,军部建立了傀儡政权,在1937年12月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在1938年3月炮制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9年12月,东方文化联盟举办了纪念联盟成立八周年的演讲会,邀请了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顾问一职的汤沢三千男就中国局势进行演讲。汤沢此后作为内务官僚担任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理事长,在东条内阁

① 关于大阪商工会议所的事变初期应对,详见战时刊行:大阪商工会議所編『大阪商工會議所史』同前、1941、333~337頁。

② 联盟创立期理事、大阪毎日满洲华北通信总局长。

③ 榑崎観一「北支の将来」『会誌』第12号、1938年1月。

时期担任了内务次官。他在大阪表达了对中日关系的担忧，称“第一，中国人厌恶日本人。纯粹的反日派但主张和平的人，却持有与抗日派完全相同的感情。第二、必须考虑到无论是和平派还是抗日派都是出于真挚的爱国情感而采取行动；第三、日本所言完全不值得信赖。必须以这三点作为基本判断的前提”。主持人佐多爱彦对其演讲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我从没听过如此深刻的讲话”。汤沢三千男明确表示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①

在东方文化联盟有关中日关系的活动中，神尾茂的演讲更引人注目。身为东方文化联盟理事的神尾茂，从大阪朝日新闻转职到东京朝日新闻任评论员，后被派遣到香港，参与外相宇垣一成的和平工作以及对汪兆铭的工作。^②

1938年12月，从重庆逃脱并发表对日“和平声明”的汪精卫开始与日本交涉。1940年3月，汪精卫发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宣言，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

在新政府成立宣言发表前不久，神尾茂在1940年2月应东方文化联盟邀请，就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新政权的建立进行了演讲。因包含涉密内容，此次演讲引起了听众们的极大兴趣，^③神尾茂自己也在日记中记录了听众的关注程度“因基于之前没人提到过的事实、说明了日本应有的态度，结果听众有两百人，最后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④

在同年5月举办的演讲中，神尾茂谈及陆军的梅机关、民间志士、报纸记者与汪精卫等人的交涉进展，说“若和平运动扩大，必然会让仅在少数人中存在的和平精神，在中日两国全民中得到彻底贯彻，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政府（指汪伪政府）成立的条件就会逐渐成熟”。^⑤实际上，“汪兆铭工作”由影佐祯昭率领的陆军梅机关负责，是包含谋略要素的复杂活动，

① 湯沢三千男「民心の把握が専要」『会誌』第16号、1940年2月。

② 关于神尾茂参与和平工作，参见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五章。

③ 虽然无法刊登全部演讲内容，但还是尽量刊登在《会志》上，参见神尾茂「和平運動の本質と新政府の使命」『会誌』第17号、1940年8月。

④ 神尾茂『香港日記』神尾瑛貴子、1957、1940年2月14日の条、183頁。

⑤ 神尾茂「汪先生伝言の二三」『会誌』第17号、1940年8月。

在这里姑且把它当成是“和平运动”来讨论。

东方文化联盟的亚细亚主义在中日关系上,可以说是经历了迂回曲折的,最终落脚于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另据回忆,作为“民间志士”,与清水银藏交好的犬养毅之子犬养健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最后,主张走向“大东亚共荣圈”。在中日战争时期,东方文化联盟出版物的纸面上逐渐浮现出走向“大东亚共荣圈”的论调。

首先,出现了将中日战争与反英斗争、亚细亚复兴相联系的“大亚细亚主义”论调。应由户田芳助执笔的《会志》十二号的序言,认为事变的意义是驱逐“英魔”,主张“此次中国事变彻底剪除了英苏扰乱远东的魔掌,将给东亚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英是我等十年来一贯的主义、主张,亚洲的解放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基础,若不使英魔退到地中海以西,世界和平便无法实现”。该序言也对当时流行的犹太阴谋说展开了说明,认为“在黎明之际,我们要充分理解、认识掌握着英美法苏最高指挥命令权的犹太财阀,对他们的动向要察觉于未然,对能左右世界和战的犹太黄金王,不可丧失戒心及放松警惕”。此外,在户田芳助的主持下,国际政经学会理事樱沢如一也做了题为“独裁世界的犹太财阀一瞥”^①的演讲,国际政经学会理事若宫卯之助还做了题为“时局与犹太人问题”^②的演讲。

户田芳助试图宣扬的“犹太人阴谋论”并未在东方文化联盟中扩大影响。但是,联盟举办的活动,基本上是追随了战争扩大形势下日本政府的政策。

与印度相关的活动逐渐增多,同时出现了与“回教民族”相关的演讲会。在佐多爱彦主持的“回教民族国际对策演讲会”上,“大日本回教协会”理事长松岛肇进行了演讲。^③“大日本回教协会”由陆军大将林銑十郎担任会长,作为占领地政策的一环受到扶持,是政府系统的研究机构,村田

① 『会誌』第12号、1938年1月。

② 『会誌』第13号、1938年7月。

③ 『会誌』第15号、1939年7月。

省藏也参与其中。^① 作为主持的佐多爱彦虽然坚持以介绍伊斯兰文化为主旨，但还是追随了占领地扩大形势下日本政府的政策。

除此之外，关于东南亚的活动也逐渐增加。联盟举办了南进论者、大亚细亚协会理论家、报界人士竹井十郎的演讲等活动。^② 上述活动都助长了日本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路。

另外，推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大岛浩作为日本驻德国全权大使，于1940年7月进行了题为“关于欧洲近况”演讲。^③ 大岛浩阐明了德国占优势的欧洲局势，最后说“如果将日本以八纮一宇的大精神为基础、与德国共同协作建设新世界秩序定为根本目的，日德协作就可以成立”，关于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他认为“既然德国已经打算征服其所有者，那就应该尽早告知德国我等的计划，使之配合我方实现意图”。主持人佐多爱彦认为“特别是像大阪这样此前亲英美派居多的城市，现在依然有大量依存英美的意见”，但“我确信通过此次演讲会，今后可以控制大阪舆论”。

佐多爱彦评价大岛浩向“亲英美派居多”的大阪听众宣扬与纳粹德国合作以向南方扩张的演讲，“将成为今后的指针”。由此可见，此时东方文化联盟距离“大东亚战争”已仅有一步之遥。

结 语

东方文化联盟是师从犬养毅的政友会众议员清水银藏为实现“亚细亚主义思想”，在内藤湖南和佐多爱彦等人的协助下，以大阪的财界、报界为后盾创设的团体。该团体策划与中国、印度、苏联等展开民间交流，举办与亚洲各地相关的演讲会等活动，逐渐渗入到大阪财界。

① 关于大日本回教协会，参见島田大輔「昭和戦前期における回教政策に関する考察 大日本回教協会を中心に」『一神教世界』六、2015年；松浦前掲書第七章。

② 竹井十郎「蘭印の国際関係と東印度民族」『会誌』第18号、1941年3月。关于竹井十郎，参见松浦正孝「日中情報宣伝戦争」、同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 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376～378頁。

③ 『会誌』第18号、1941年3月。

在清水银藏主张的亚细亚主义中,“协作”因素很强,不用于“盟主论”性的“大亚细亚主义”。清水银藏主导下的联盟活动对日本大陆政策持批判态度,带有与现实相对立的紧张感。

联盟举办了多次外交官的演讲,主导者颇得意于其独立性。佐多爱彦理事认为东京的亚细亚主义团体大多都接受了军部或政府的赞助,但东方文化联盟则保持独立活动。他甚至断言“若将国家之间的交涉都任由日本历代如此无能的外交官处理,则不知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①

大阪是远离政治都市东京的经济贸易都市,清水银藏和佐多爱彦在此推行国民外交,故此他们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为止都持有此种自信。然而,将东方文化联盟在中日战争期间的活动纳入考察范围就会发现,这种自信是一种过高的自我评价。

清水银藏去世后,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东方文化联盟的活动逐渐变质,最终追随时局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之路。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吴琼译,王美平审校)

附 《东方文化联盟会报》目录

『東方文化聯盟會報』第1号(1932年12月)

東方文化聯盟會報設立に至るまでの経過…理事 清水銀蔵

文明の母亜細亜…印度志士 ラス・ビハリ・ボース

東亜の文化…サー・ハリシン・グール博士

芳沢前外相の講演…芳沢謙吉

満蒙開発及び大亜細亜主義の国民的理想の統一結成に就て…栗本勇之

介

精神文明の封揚…理事 岩井勝次郎

^① 佐多前掲「文化的親善運動の意義」、16頁。

亜細亜聯盟に封する日本の使命…理事 末広重雄
何故ガンジーは絶食したか 附印度に於ける英国の法規…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オリエンタル、カルチュア、リーグ（英文）…エ・エム・サハイ
我觀東方文化聯盟…戸田芳助
漫言一束…黎仙生
会告
編輯後記

『東方文化聯盟会報』第2号（1933年6月）
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理事 内藤厩次郎
変り行く印度…前カルカッタ総領事 酒匂秀一
日支親善に就て…駐支公使 有吉明
東洋文化について…同一等書記官 須磨弥吉郎
人種関税の両差別を撤廃すべし…理事 岩井勝次郎
大英帝国の姿を見よ…伊藤忠商事会社専務取締役 伊藤竹之介
東方文化聯盟の使命…清水銀蔵
志那百年の大計…細井肇
殖民帝国の苦闘…主幹 戸田芳助
通商時象から見た文化の差異…印度志士 アール・ビー・ボース
随想漫言…黎仙生
会務記事、彙報

『東方文化聯盟会報』第3号（1933年第12月）
巻頭言
日本文化と亜細亜觀…サア・ラルバイ・シヤマルダス
暹羅の国状と日暹關係…全権公使 矢田部保吉
亜細亜の解放と日本の立場…インド・タイムズ社代表 チヤマンラル
東亜政策の根本義…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長 鹿子木員信

亜細亜の恢復と日支の関係…理事 清水銀蔵
印度語に就て…全孟買日本人協会書記長 中川修吾
崇高なる精神文化の照顧…理事 岩井勝次郎
亜細亜問題 (英文) …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日貨の世界的進出は東方文化の捷利也…主幹 戸田芳助
縮想事象録…黎仙生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4 号 (1934 年 4 月)

巻頭言
日印会商の感想…大阪貿易館長 花岡芳夫
北支政權私見…理事 榊尾茂
東洋の国家主義と西洋の国家主義…印度志士 ラス・ビハリ・ボース
宗教的結合と無声の魅力…理事 岩井勝次郎
中華民国の近状…駐華全權公使 有吉明
載典仇著日本論を読む…大東万里
印度に於ける仏教の現状…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非理法權天…主幹 戸田芳助
経済学は何処へ行く…黎仙生
内藤湖南博士を哀悼す…戸田芳助
緬想事象録…黎仙生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5 号 (1934 年 12 月)

巻頭言
我国際通商上に於ける政治的文化的交渉…大阪毎日新聞副主筆 下田
将美
日蘭会商の経過と批判…日本蘭印貿易協会長・日蘭会商雜貨業代表
有馬彦吉
太平洋問題と日蘭会商の真相…竹井十郎

北平訪問飛行と最近支那の印象…朝日新聞東亜部長・本連盟理事 神尾茂

満州視察より帰って…朝日新聞主筆 高原操

満支視察帰朝談…理事 清水銀蔵

内藤湖南翁を憶ふ…理事 清水銀蔵

有色人種の崛起と白色人種の衰微…印度志士 ラス・ビハリ・ボース

印度の理想と阿富汗人の実行力…木内久吾

初冬夜話…戸田黎仙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6号(1935年7月)

巻頭言

中日の親善融和は個人的国民外交から…中国銀行大阪支店長 載克諧

満州国雑感…大阪毎日新聞主筆 高石真五郎

空談を排して実現へ…満州国民生部大臣 臧式毅

北鉄委譲が齎らす画期的効果…駐日サ聯大志 ユーレネフ

日華親善は文化提携から…駐華全権大使 有吉明

大阪の隆昌は儒教文化から…駐日中華民国大使 蔣作賓

満州国及比率賓の独立と亜細亜…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有色人種の怒濤』中の数節

故内藤湖南翁追悼会

一貫不変の国是…戸田黎仙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7号(1936年1月)

巻頭言

蘇国内外情勢と日蘇経済提携…駐蘇全権大使 太田為吉

日貨進出の将来性は西亜に無くして支那印度にあり…特命全権大使

松島肇

北支那の綿花…京都帝国大学農業部教授 榎本中衛
東方文化聯盟の使命に付て…理事 清水銀蔵
岩井勝次郎氏を哀悼す…戸田芳助
印度の文化一斑…木内久吾
松島大使の講演を聴きて…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緬想事象録…戸田黎仙
留学生招致趣意書及留学生保導一般要領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8号(1936年7月)

巻頭言
印度に旅して…慶応大学教授 野口米次郎
北支各大学教授学生歡迎晚餐会
羅維国公使講演午餐会
道德は根幹、科学は枝葉なり…駐日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 許世英
任家豐氏・揚雪倫氏 歡送迎会
日印文化交換午餐会
「ロシア」事情座談会
西阿弗利加海岸処女航海座談会
広東広西情勢座談会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9号(1937)

巻頭言
創立五周年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て…理事 清水銀蔵
中国要人の対日態度の一考察…駐羅特命全權公使 石射猪太郎
五周年記念祝賀会開会辞…理事 佐多愛彦
欧米使節一班…元外相 吉沢謙吉
蘇連反幹部陰謀事件…大毎東亜部 小林英生

最近支那政情座談会…大毎東亜副部長 松本鍵吉

日独協定、対蘇対支外交問題座談会…神尾茂、平川清風、松本鍵吉、
三池亥佐夫、小林英生、清水銀蔵、戸田芳助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0号（創立五周年記念臨時特集 日支関係
打開号）（1937年5月）

序文

清水銀蔵君の急逝を哀悼す…戸田芳助

東方文化連盟の使命…理事 清水銀蔵

文化的親善運動の意義…理事・医学博士 佐多愛彦

大陸政策の合理性と日満支経済ブロックの結成…理事 栗本勇之助

サハイ君紹介の辞…法学博士・末広重雄

世界平和と東洋文化…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紹介辞…司会者 戸田芳助

我国今日の状況…中央通讯社東京特派員 陳博生

我国の日本に対する希望…同 陳博生

支那が廃棄を要求する不平等条約とは何ぞや…理事・法学博士 末広
重雄

仏教を通じて見たる日華提携…日華仏教研究会長 林彦明

亜細亜思想の下に…関西日印協会理事 小林義道

対支漫言…戸田芳助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1号（1937年7月）

巻頭言

野生司画伯歓迎午餐会…理事 佐多愛彦

丹精途上予想外の苦心…野生司香雪

陳博生氏招請講演午餐会…佐多愛彦

先提は相互信頼…中国通讯社特派員 陳博生

印度商務官及觀光團歡迎午餐會

着任第一印象…商務官 サクセナ 通訳 エ・エム・サハイ

答辞…觀光團長 エム・エル・ヴァヤス

陳博生氏を囲んでの座談

弔辞…理事 佐多愛彦

弔詞…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印度教と仏教

印度からのニュース・レター

北支問題…黎仙生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12 号 (1938 年 1 月)

巻頭言

北支の将来…大毎満洲北支通信総局長 檜崎觀一

対支文化施設の根本要素…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長 新城新蔵

故清水理事追悼会挨拶…理事 佐多愛彦

追悼辞…逋信参与官・代議士 犬養健

日支事変に就いて…東亜同文書院長 大内暢三

世界を独裁する猶太財閥のグリンプス…国際政経会・理事 桜沢如一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13 号 (1938 年 7 月)

巻頭言

英国の伝統政策と最近の印度事情…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和蘭の国民性について…台湾帝国大学・教授 浅井恵倫

南方情勢と南方人の声…南方情勢社主幹 竹井十郎

第三国人の支那事変観…前フィリピン総督顧問 ピーター・ダブリュ
ー・リーヴス

時局と猶太人問題…国際政経学会・理事 若宮卯之助

世界回教徒の動向…須田真継

特別付録

大公が黄河治水事業に就て…渡辺金三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4号（1939年12月）

巻頭言

第三国人としての支那事変観…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独逸の近状…理事 佐々木駒之助

国亡ぶれと文化は征服されず…イデル・ウラル・トルコタタル・文化
協会神戸支部副支部長 カヂス・アリ

アラビア中心の防共協定締結を望む…アラビヤ代表 エム・マキー・
タシカンデー

信教の自由は我が国独特の容認…貴族院議員 稲畑勝太郎

文化提携以外に真の親善なし…貴族院議員・理事 森平兵衛

思想戦である限り百年戦争も辞せず…朝日新聞・名誉主幹 高原操

慈眼愛敵は日本人の特性…京大名誉教授・理事 末広重雄

蓄積した東方文化の再放射…印度志士 エ・エム・サハイ

近衛声明と汪兆銘声明…

緬想余祿…黎仙生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5号（1939年7月）

巻頭言

回教民族の国際対策講演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多 愛彦

挨拶…大日本回教協会理事長 松島肇

回教事情…同調査部長 匝嵯胤次

回教対策…同総務部長 松村孝良

印度観光団歓迎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多愛彦

欧米式外装に包まれた日本精神…日本視察団長 ジョージ

日本の精神的支援下に “東洋人の東洋、の復興…ユナイ テットブ
レス社代表 ビー・ジー・シヤルマ

サハイ氏著 “印度□読後感…戸田黎仙

印度人英語の使用の弁

“白人を敵として□の読後感…玉倉宇多種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16 号 (1940 年 2 月)

平川清風君の逝去を哀悼す

巻頭言

印度事情講演会

開会の辞…佐多愛彦

東洋第三国民族として中国の朝野に慇懃…印度志士 A・Mサハイ

事变前後の印度事情と英国の逆宣伝…哲学博士 滝照道

ザカリヤ氏講演会

挨拶…佐多愛彦

今度は欺かれない…前カルカッタ市長 エー・ケー・ザカリヤ

定時総会及び講演会

開会の辞…佐多愛彦

民心の把握が専要…前北支那政府行政顧問 湯沢三千男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 17 号 (1940 年 8 月)

巻頭言

神尾茂氏講演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田愛彦

和平運動の本質と新政府の使命…東京朝日論説委員・東方文化連盟理

事 神尾茂

閉会の辞…佐田愛彦
三谷、神尾両氏講演会
挨拶…理事 佐多愛彦
外務省文化事業に就て…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長 三谷隆信
汪先生伝言の二三……神尾茂
会務記事
会員の訃報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8号（1941年3月）

巻頭言
大島前大使午餐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多愛彦
欧州の近状に就いて…駐独全権大使 大島浩
謝辞…理事 佐多愛彦
竹井氏講演午餐会
開会の辞 佐多愛彦
蘭印の国際関係と東印度民族…竹井十郎
神尾氏午餐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多愛彦
三国同盟と支那事变処理…同 神尾茂
挨拶…同 佐多愛彦
森正蔵氏講演会
開会の辞…佐多愛彦
蘇連の内外事情と列国の情勢…東京日日新聞ロシア課長 森正蔵
会務記事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19号（1941年10月）

巻頭言
穂積三雄、高岡大輔氏講演午餐会

挨拶…理事 佐多愛彦

仏印・泰見聞の二三…大毎経済部長 穂積三雄

誤った印度觀を是正せよ…衆議院議員 高岡大輔

田中長三郎博士講演午餐会

挨拶…理事 佐多愛彦

大東亜共栄圏と植物資源…農学博士 田中長三郎

挨拶…理事 栗本勇之助

挨拶…佐多愛彦 カマラ・デヴィ女史歓迎講演会

開会の辞…理事 佐多愛彦

紹介…印度志士 エー・エム・サハイ

物心両面の東方文化と新印度の使命…カマラ・デヴィ

閉会の辞…佐多愛彦

会務記事

World History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or Yu Xin-chun'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i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 Cheng-ri / 251

Abstract: As a famous researcher on history of Japanese diplomacy and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Professor Yu Xin-chun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history. In particular, he has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diplomacy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 career of historical research, Professor Yu has focused on a wide range of areas, which span a long time period. In addition, he emphasizes th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primary materials. Professor Yu is ready to adopt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he uses Marxist historical dialectics and “contradic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complex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hereby has made considerable eye-catch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at demonstrate his acumen and insights.

Keywords: Yu Xin-chun, historical philosophy, Japanese diplomatic histo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ntradiction theory

Eastern Cultural Federation: Asianism in Osaka in the 1930s

Takiguchi Tsuyoshi / 270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sianism in Osaka in the 1930s, focus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Eastern Cultural Federation”. Organized in 1931 and obtaining support of business circles and newspapers in Osaka, the Eastern Culture Federation’s aim is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and affinity of the Eastern peoples”. It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ith Asia, and it held various lecture presentations and published bulletins. The leaders of the Eastern Culture Federation had pride in conducting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Osaka, an economic and trading city and a political center away from Tokyo. In addition, their Asianism, which was strongly motivated by solidarit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which advocated that Japan should serve as the leader of an

Asian Alliance. However , after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1937 , the activities of the League quickly became reactionary , and the Association began to support Japanese expansionist goal of building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

Keywords: Eastern Cultural Federation , China-Japan relations , East Asian relations , Anti-Japanese War

(本期英文提要及关键词 , 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聚国副教授翻译)